

北京吉利大学 BEIJING GEELY UNIVERSITY

中国民办大学报告

2009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北京吉利大学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中国民办大学报告 2009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北京吉利大学 主编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办大学报告·2009/北京吉利大学主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51-1780-8

I. 中… II. 北… III. 民办学校:高等学校-研究报告-中国-2009 IV. G64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7503 号

书 名 中国民办大学报告·2009

主 编 北京吉利大学

责任编辑 肖景华

责任校对 刘文芳

封面设计 胡海莲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E - mail 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 辑 部 010-84049774

发 行 部 010-64037154

印 刷 北京康利胶印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16

字 数 578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1780-8 定价: 60.00 元

主 编：北京吉利大学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兴贵	付春新	史 朝	田 捧	刘华松	江树人
李书福	李延成	李克安	李志仁	沙 红	陈乃芳
姜国忠	贺春兰	高志明	程方平	葛海良	蒋国华
蔡言厚	戴盛中				

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來。

鄧小平 一九八三年國慶節
書贈 景山學校

鄧小平同志為景山學校題詞（1983年）。



北京自修大学
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为北京自修大学
题写校名（1984年）。

湖北函授大学

中国农民大学

胡耀邦同志为中国农民大学
题写校名（1985年）。

李先念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

李先念同志为湖北函授大学
题写校名（1985年）。

北京人文函授大学

王震题

中华社会大学

彭真
一九八四年

社会办学、培养
更多有用人才
陈云题
一九九三年

陈云同志为中华社会
大学题词（1993年）。

王震同志为北京人文函授
大学题写校名（1984年）。

彭真同志为中华社会大学
题写校名（1984年）。

序

陶西平

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史，我们会发现私立大学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公办大学。远的如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设坛讲学不说，自“书院出现于唐代”，宋代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明代河东书院、石门书院，到清末教会学校演变过来的圣约翰大学等，都比我们的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创办得要早。即如果追溯中国大学的起源，应该是起源于私立大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52年之后，中国取消了所有的私立大学，包括最有名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一直到1978年，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教育界也开始解放思想，中国的私立教育（这时叫民办教育）才重新开始得到恢复，而新的民办大学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3亿6000万人。自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连续实行扩招之后，中国大学的招生人数十年期间扩大了5倍，在校生人数扩大了4倍。2007年底，中国大学的在校生人数达到2700万人，适龄人口入学率达到23%。而在这里面有公办高校1908所；民办普通高校297所，在校生163.07万人，其中本科生21.12万人，专科生141.94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22.36万人；独立学院318所，在校生186.62万人，其中本科生165.68万人，专科生20.94万人，另有其他形式教育的学生0.87万人；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906所，各类注册学生87.34万人。这就是说，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民办大学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放眼世界，各个国家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都是积极支持私立大学的发展。国外私立大学的历史比较悠久，像美国在17世纪就开始了，东部最早的九所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是私立大学；我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私立大学在本国大学总量中都占据绝对的多数。中国现代的私立大学的历史不长。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私立大学发展的态势比较好，主要归功于国家的政策。特别是1999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一股春风，这是非常好的大环境。国家对民办教育第一是鼓励，第二是规范，私立大学也是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办出了学校的特色。我个人认为，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很好的，前景光明。当然，鉴于总体办学实力、师资队伍、学校传统以及文化的积淀等等都需要过程和时间，同时学校内部的管理也需要不断的优化，我国私立高等教育任重道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只要在私立高等教育战线工作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政府不断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一定会成为我们国家高等教育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中国迟早会出现在国内和国际上著名的私立大学。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民办大学报告 2009》一书，就是民办的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和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天津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授们，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可以说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之后比较系统研究中国民办大学发展、演变暨纪念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综合性研究报告。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再造历史”、“成就现实”和“走向未来”，对 30 年来中国民办大学的沿革、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中国的民办大学可以说还非常年轻，但是其生命力却非常旺盛，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要走向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就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必由之路。本书除了理论阐述之外，还收录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民办教育的政策法规、民办教育的大事记以及民办大学的若干统计资料等，为教育界的同仁提供了一份非常翔实的参考资料。北京吉利大学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告诉我，该报告只是他们关于民办大学研究的一个开端，今后他们会将这一研究以年度报告的形式，持续进行下去，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累积资料，总结经验，建言献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强国的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民教育意识的普遍增强，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民办教育仍处在发展的起始阶段，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做好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民办大学的办学质量，突出自身的办学特色，将是民办大学今后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前提。一年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经过法定程序正式宣告成立，一方面表明国家对民办教育“鼓励和规范”政策的一个组织支持，另一方面表明以政府办学为主、公办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李书福先生作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亲自主持和组织编写《中国民办大学报告 2009》，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他要我在报告出版之际，写上几句话，也代表我由衷的一种祝愿和期盼！是为序。

国家总督学顾问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2009 年 5 月 6 日

目 录

序	陶西平 (1)
引 言	(1)
绪 论	(3)
上篇 再造历史	(13)
第一章 民办大学的缘起	(15)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传统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6)
第二节 1949 年后中国大陆民办高等教育阶段性消亡的启示	(18)
第三节 新时期民办高等教育的孕育与发展	(19)
第四节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复兴和“再造”的重要价值	(24)
第二章 民办大学的沿革	(26)
第一节 恢复与重振时期 (1978 ~ 1991)	(26)
第二节 实践探索时期 (1992 ~ 1997)	(28)
第三节 相对规范时期 (1998 ~ 2002)	(29)
第四节 注重内涵建设和法制化建设时期 (2003 ~)	(31)
第三章 民办大学的分类	(33)
第一节 中国民办高校的办学种类及其变化	(33)
第二节 事业还是产业? 营利还是非营利?	(35)
第三节 中国民办高校种类的变异及其问题	(35)
第四章 民办大学的演变	(37)
第一节 办学主体的演变	(37)
第二节 办学目的的演变	(41)
第三节 办学策略的演变	(42)
中篇 成就现实	(49)
第五章 民办大学的巨大成就	(51)
第一节 民办大学的发展成就	(51)
第二节 民办大学的社会贡献	(59)
第三节 民办大学的历史地位	(67)
第六章 民办大学的社会功能	(70)
第一节 民办大学之勃兴改变了传统的人才观念	(70)

第二节	大学之民办凸显了现代教育的产业属性与功能	(74)
第三节	民办大学具有引领教育创新的天然品格	(80)
第四节	民办大学催生、促进社会新行业的诞生	(84)
第五节	民办大学竞争力是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86)
第七章	民办大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90)
第一节	十字路口、应运而生，是民办大学诞生的时代机遇	(90)
第二节	政府支持、政策宽松，是民办大学立足的根本基石	(94)
第三节	探索试验、渐进改革，是民办大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98)
第四节	市场导向、教育为本，是民办大学遵循的两个规律	(101)
第五节	法人治理结构、现代学校制度，是民办大学可持续发展的两个制度	(103)
第八章	民办大学发展中潜在的问题与挑战	(107)
第一节	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107)
第二节	法律制度现状与问题	(109)
第三节	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缓慢	(112)
第四节	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与教育生存的社会环境亟待改进	(116)
第五节	投资、融资及退出机制缺失	(121)
第六节	民办大学公立化倾向	(125)
下篇	走向未来	(129)
第九章	民办大学发展的战略机遇	(131)
第一节	国家意志：国家构建人力资源强国的勃勃雄心	(131)
第二节	社会需求：对优质高等教育的渴望	(134)
第三节	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供给不足，结构失衡，创新乏力	(138)
第四节	教育产业和市场化改革：十字路口上的现代教育	(144)
第五节	把30年经验作为新的起点，抓住新机遇，创造新业绩	(152)
第十章	民办大学发展的战略选择	(159)
第一节	制度创新：高等教育民营化和公办大学向民办大学转制	(159)
第二节	加强法制层面的改革，完善立法工作	(163)
第三节	创新政府职能，为民办大学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167)
第四节	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确立明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	(170)
第五节	建立投融资激励机制，促进对民办大学的投资	(173)
第六节	鼓励和促进民办大学教育创新	(175)
附录		(179)
	法律、法规、规章	(181)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大事记	(239)
	历年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	(267)
后记		(305)

引 言

过去 30 年前，并由此上溯至公元之前的漫长岁月，在古老的中华文明史上，孕育、出现过比较发达的古代私立大学。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在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中国出现过一个现代私立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曾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过积极努力的私立大学销声匿迹达 30 年之久，私立大学的悠久历史出现阶段性的中断。

过去 30 年间，在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中，民办大学在中华大地上重新生根、萌芽、发育、成长。中国的民办大学是中国 30 年来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同时，它又是改革开放的贡献者，促进了中国教育、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其功勋卓著，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

- 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
- 扩大了高等教育整体规模，提升了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教育竞争力；
- 激活了社会投资教育源头，开辟了非财政性教育投资渠道；
- 创新了办学制度教育内容，启迪了公立高等院校的改革与创新；
- 创造了大量社会就业岗位，有效利用了社会智力资源。

这些成就的取得，

- 是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社会转型进步的结果；
- 是政府驾驭改革和执政能力提高、宽容对待新生事物的结果；
- 是民办大学创办者、管理者和教职工百折不挠、艰苦创新的结果；
- 是教育体制改革和社会、家长、学生的迫切需求持续推动的结果；
- 是中国私立大学悠久历史的传承和再造、国际高教经验学习和借鉴的结果。

因而我们认为，中国民办大学已经并正在铸造自己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

-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办大学既是对中国私立大学传统的复兴，也是在新时期的“再造”；
-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民办大学是世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从改革开放全局来看，民办大学是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最重大的制度创新之一；
- 从高等教育体系来看，民办大学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 40 年，至建国 100 周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这是中国全面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全面推动人类历史进步、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将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突出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核心性作用。这就要彻底改变大批适龄青年依然不能就读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依然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教学科研质量依然有待全面提高，教育制度安排依然不尽合理等重大问题。当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行将发布，新一轮教育改革和振兴计划即将启动。这将为民办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

但是，民办大学依然面临诸多棘手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问题主要体现在制度上的法人治理结构、

现代大学制度、投融资和退出机制等的缺失和不健全等方面；体现在学科结构、地域结构、办学水平上的不平衡等领域。挑战主要来自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就业市场的变化、公立高等院校的不对等竞争、全球化浪潮以及新技术手段的涌现等方面。

为此，民办大学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发挥勇于并善于创新的精神，携手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公共治理结构、投融资机制、办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教育和就业关系等领域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

历史业已证明，教育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能够决定和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历史还将证明，有悠久丰厚的历史和飞速进步的现实的中国民办大学教育，必将有一个更加辉煌成功的未来。

绪 论

在当代,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与发展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或者毋宁说,更像是一场革命。它一方面表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最伟大功绩之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式的变革,正在以同样的历史必然性渐进式地向传统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高教领域缓步走去;另一方面,民办大学之艰难崛起、矢志探索和实践创新,正在给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希望的活力和深远的影响。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民办教育,包括民办高等教育,就是在党的科教兴国、教育优先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方针指引下,在国家“教育的勃兴”过程中灿烂绽放出的一枝奇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办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生与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造与发展,同样成就巨大,举世瞩目,影响深远。

由教育部周济部长担任顾问、袁贵仁副部长任组长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于2008年9月出版了研究报告《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其中有一小节谈到民办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办教育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统计表明,到2007年底,全国共有民办大学1521所(其中独立学院318所、民办普通高校297所、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906所)。若仅以学校数量来说,与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相比较,已占全国大学总数的44.36%,近乎二分天下各占一半的规模。^[1]作为民办大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率先“异军突起”,其根本原因还是要到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去寻找。

回首30年,民办大学在中华大地上重新矗立,首先是邓小平同志支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的产物

3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社会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一直相伴随,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改革开放。民办大学亦然。没有邓小平同志支持和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公办以外的任何教育机构都不可能存在,遑论作为高等教育的民办大学了。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之初,且不说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面临着诸如“两个估计”这样的政治障碍和重重困难,就是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也还没有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以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育领域作为突破口,开启了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伟大航程。陈至立同志在为《教育

大国的崛起 1978—2008》作序时明确指出：“中国教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步伐”的起点，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做出恢复高考及对外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2]换句话说，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教育改革开放首先发端于与高等教育密切相连的这两件大事。由此足见，高等教育在整个国家教育事业中具有高端地位，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拥有被渴求地位，因而在国家改革开放中赢得了先头地位。无独有偶，有专家考证，中国民办教育迈出重新开办的“历史性步伐”的起点也是民办高等教育。要确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复兴的起点，首先其开办的时间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前后，即 1978 年 12 月 18 日前后。据我国民办高教研究专家邬大光教授考证：“有的认为其起点应是 1978 年 10 月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创办补习班，有的认为应是 1982 年 3 月北京创办的中华社会大学。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把中山业余大学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民办高等教育的雏形，把 1982 年创办的中华社会大学作为民办高等教育复兴的标志。”^[3]从民革中央网站介绍可知，确切地讲，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的前身为韭菜园青年文化补习班，1983 年 10 月由民革湖南省委会接办，改用现在的校名。^[4]至于对中华社会大学而言，又有人说，那只是“助学机构”而已，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历教育。^[5]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中华社会大学乃是一所由范若愚、聂真、张友渔等著名教育家主持创办并经北京市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学校主要教育教学设置均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历教育”的民办大学，只是作为新事物其学历在当时尚未具备申报的政策环境和得到承认罢了。在中华社会大学开办之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为之题写了校名，陈云同志特地题写了“社会办学，培养更多有用人才”条幅，薄一波、邹家华、钱伟长、宋健、余秋里、肖克、袁宝华、高扬文等老同志也都先后题词，支持她，赞扬她。这么多老同志、老领导为一所创办伊始、尚未纳入国家办学体系的民办学校题词，这在我国民办大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仅仅认为是为一家“助学机构”题词，则恐怕难以解释得通。其原因必须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去寻找，那就是这些老领导老同志都非常清楚、理解和支持邓小平同志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因此他们把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办看做我国教育领域里解放思想的一次尝试、一个标志。不久后的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1984 年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北京自修大学命名并题写了校名，这也是我国唯一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民办高校。这所民办学校最初成立于 1977 年，是粉碎“四人帮”后，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主的一批教师倡导成立了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以语言文学函授方式，向广大中青年传授知识。当时，地质出版社考虑到广大野外地质人员的学习需求，与北师大联手合作，函授教材由地质出版社出版，每半月一期，直接寄给学员。教材都由国内顶级大师撰写，分别开设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古代文学等。1984 年，在第一批学员学习结束后该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自修大学。当年的毕业证书封面已经是邓小平同志所题的“北京自修大学”校名。该校由著名教育家刘季平先生、著名教育艺术家李燕杰先生等创办，刘季平先生（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担任北京自修大学首任校长，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担任学术委员会文科部主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教授钱致榕先生担任学术委员会理科部主席。季羨林先生、侯仁之先生和李燕杰先生担任北京自修大学名誉校长。北京自修大学建校 31 年来，培养了 30 多万名学生，业绩卓著，桃李满天下。姜春云（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海迪、曹雁、蔡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同志都是该校毕业生。^[6]

30 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贯穿改革开放始终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三个历史性事件可以说明：一是 1978 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二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对姓“社”姓“资”的问题的争论，使党内在对计划和市场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争论之后，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 1997 年十五大针对姓“公”、姓“私”问题的争论，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30 年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解放思想不断引领和推进各个领域各项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向前的

历史。或许，一定程度上受到民间创办中华社会大学的激励，北京另一所民办大学——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紧随其后，紧张筹备，并于1984年3月6日，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专科性高等学校。作为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的民办高等院校，北京海淀走读大学不仅在北京市而且在全国均属领先。对民办大学来说，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指引下，有人创办了第一所，一定有人会去创办第二所、第三所，以致形成今天的万紫千红，满园春色——千余所各级各类民办大学的繁荣局面。

回首30年，民办大学在中华大地上再造繁荣，标志着我国教育办学体制重大变革的开始

建国以来，我国对于社会教育事业的管理，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办学体制。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定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正是这种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把中华民族私立教育的悠久传统连同当时仅存的各类私立学校，一并转制和取消了。所以，早在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教育要改革的思想。他说：“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7]邓小平同志要我们“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讲话，就是指示我们坚定地回到党的教育方针指引的正确轨道上来，要恢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中国现代教育的本来面貌。在邓小平要搞好教育改革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思想的指引下，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中思想的解放和对高中后教育的渴求，共同推动了像长沙韭菜园青年文化补习班和北京中华社会大学这样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复兴。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重新出现，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则首先碰到的是体制问题。教育改革想前进一步，首先遇到的就是旧有体制的严重束缚。因为民办大学的出现本质上隐含着对由国家统包统管的旧教育体制的否定。尽管像中华社会大学的成立得到了当时的北京市成人教育局的批准，但在国家层面上依然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依据的许可和支持。当此之时，党的体制改革的东风正如及时雨般吹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出台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突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的感召下，北京中华社会大学和长沙中山业余大学这样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之诞生出现，尽管在时人眼里显得不够正规，也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文凭许可，但是，它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重大变革即将开始的新时代。

回首30年，民办大学在中华大地上生存与发展，是顺应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要普及化需要和趋势的历史产物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贯彻始终的重大战略决策；特别是世纪之交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两者一体，构成了新世纪新阶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两个战略目标和两个战略支柱，集中反映了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加快教育发展与人资源开发的坚定决心。

值得指出的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乃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在他改革开放、

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8]“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9]如今我国教育界可以告慰邓小平同志在天之灵的是,一方面,2000年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堪称典范。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于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将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定,乃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普通本专科招生599万人,是1998年的6倍,高等教育在校生2700万人,其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02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7年入学率已达到23%。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既是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也是顺应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要实现普及化的需要和趋势。毋庸讳言,在这历史性成就中,就有民办高校的功劳。除了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500余所民办大学的国家高考统招生外,众多民办大学还招收和培养数量更为庞大的非学历教育的“民办大学毕业生”,同样为数百万的落榜青年学子提供了或许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学习机会,对于国家着力改善教育公平,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将作为一座丰碑,载入我国教育发展的史册,那么,在这座丰碑上一定刻有民办大学的名字与功勋。

回首30年,民办大学在中华大地上“异军突起”,是处于十字路口上的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办大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一样,率先“异军突起”,并随后高速度增长,达到了今天在全国3429所高等学校中占有近一半的规模,除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国家民办教育政策出台及环境的改善,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社会供给的矛盾始终存在等影响以外,从时代发展来看,中国发展民办大学适逢其时,走的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一条处于十字路口上的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研究表明,现代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已然日趋明显的十字路口。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经“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大趋势,席卷全球,势不可挡。自美国在197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0%,率先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到2004年,全世界已有38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几个特大城市,如北京于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达到了52%。据有的专家估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100个左右的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10]近代世界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的确与教育相伴相随,国运兴衰也的确与教育发展及人力资源开发相联系。德意志普鲁士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1871年普鲁士军队彻底击溃法军主力,俘获法国皇帝时普鲁士统帅毛奇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在小学课桌上就决定了”!

在不过近一个半世纪之后,这张决定国家胜利的“课桌”已经被历史地搬进了大学的课堂。例如,近几年军队中高技术兵种的征兵对象早就从仅仅坐过中小学“课桌”的学生,转向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因此,毫无疑问的是,1999年5月党中央借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之机,果断决定扩大我国高教规模,是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归根结底靠人才,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教育。”^[11]2008年以来,由于暂时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而导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得社会和媒体对于自1999年以来的党中央扩大高教规模的战略决策,出现了部分或强或弱的质疑之声。应当说,倘若有人仅凭切身感受或感性认识发出抱怨,那是情有可原的;但倘若决策者短视了,我们大学依旧维持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足15%的“精英化”水平上,那必将是民族的灾难!试问:作为教育大国,仅凭公办大学能抵达从“大众化”过渡到“普及化”的胜利顶点吗?毋庸讳言,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最终实现,离不开民办大学,更遑论实现普及化了。

第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滞涨现象已经显现。据我国著名国际比较教育专家陈永明教授最新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该国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值是6.5%,发展中国家平均值是4.1%,全球平均值是5.1%。^[12]我国基本上多数年份为不足3%,只有少数年份在3%左右徘徊。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前,吁请世界各国在2000年实现6%的目标,但是,当新世纪第一个10年行将过去之时,看来6%的目标也不可能变成现实。众所周知,德国是世界上以国家法令最早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因而,国际教育史学界认为,“德国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早于法国100年,早于英国200年”。^[13]还以德国为例,1880年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其时英法两国为1.3%),21世纪初,这个数字则达到了6.3%。研究表明,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从1.6%到6.3%,表征德国的国民教育制度从幼年期到成年期的跨越。如同生物界经过幼年期的指数增长之后,要指望在成年期还出现类似的显著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有研究指出,世界各国的这个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的成年期,要比想象的早:“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经历了由高到低、趋于静止的变化过程。”^[14]所谓“趋于静止”,用国际上以时间序列展开的发展研究术语讲,就是零增长。在整个国家教育经费零增长的情势之下,其高等教育怎能独善其身呢?美国属于发达国家,他们自认为“20世纪就是美国世纪”。研究表明,尽管20世纪的百年间,美国经历了从崛起 to 强盛和20世纪末达到“一超独大”的程度,但是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总经费中负担的份额,从20世纪初的37.3%,经中叶逾50%,到20世纪末又回落到38.4%。近几年我国高校欠债风波,本质上是“整个国家教育经费零增长的情势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2009年3月7日下午,在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就教育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全国的高等教育大概有两、三千个亿的银行贷款”,即欠债,但大学贷款,是“中央政府允许高等学校贷款扩招,这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这是为了全国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上大学”,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国家的投入没有跟得上”。^[15]毋庸讳言,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滞涨现象,乃是对民办大学必定有硕大发展空间的一个最好佐证。

第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已经由潜到显。从理论上说,大家知道,办教育是要花钱的,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不论是政府办,还是非政府办,概莫能外。这种花钱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教育领域里的生产关系,是在这种称为教育的劳动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我们说,教师从事的劳动主要是属于精神生产范畴,教育工作者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根据正在于此。对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给予精辟阐述的第一人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因此,教师的劳动服务“应加入劳动力的生产或再生产费用”,“购买这